



张 辉 宋炳辉 主编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术文库

谷 裕 著

近代德语文学中的 政治和宗教片论

 复旦大学出版社

近代德语文学中的 政治和宗教片论

谷 裕

復旦大學出版社

序

笔者十几年来的研究都没有离开“德语文学与基督教文化”这个议题,除专著外也发表过一些学术论文。承蒙北京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所张辉教授邀请,我以“近代德语文学中的政治和宗教片论”为题编成这个文集,旨在通过文本分析和阐释,展示德语文学与启蒙时代所开启的现代世俗世界的关系,加入这套比较文学系列丛书,就教于学界同仁。

按兰克的说法,欧洲的近代历史是罗曼—日耳曼诸民族走向独立王权国家(或民族国家)的历史。众所周知,神圣罗马帝国始终未能将德意志民族凝聚成统一的王权国家,即便是1871年的德意志帝国,也未能统合奥地利。由于政治和宗教分裂,德意志民族的统一仅见于“血统”和语言两方面。通过展现近代德语文学历史进程中所反映的政治和宗教问题,笔者希望这部文集能够揭示德语文学史的一个重要侧面。

这些研究成果写作时间先后不同,呈现的是笔者十余年来的进学阶梯,笔者也由此得以步入很多未知的领域。衷心感谢张辉教授和复旦大学出版社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温故知新,促进新一轮的学习和思考。

谷 裕

2018年3月阳春修订于京郊西二旗

目 录

序	1
---	---

引言 近代德语文学的开端与基督宗教

世俗化及宗教与文学的转换	3
两种特殊新教文化与德语文学	9

启蒙修养与新宗教意识

“修养宗教”：“修养”及相关问题	29
“艺术宗教”：瓦肯罗德的《倾诉》与宗教审美经验	49
伊默曼的《蒙豪森》与“新宗教”构想	61

市民生活与文学

君主教育与文学的公共性：沃尔弗拉姆的《帕西法尔》	81
世事百态与类型形象：《痴儿西木传》	98
《安通·莱瑟》与文学的内在性问题	121
从市民家庭到公共生活：《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	136

政治和宗教危机中的文学

诺瓦利斯诗化的政治与宗教	149
思想史语境中的德语修养小说：创作与诗学	168
歌德《浮士德》终场解释与政治守成	188
凯勒的《绿衣亨利》与新教伦理	208
冯塔纳小说的政治话语与宗教取向	218

走向德意志帝国

19 世纪德语文学经典的确立	245
政治天主教主义与天主教文学	252

引言

近代德语文学的开端与基督宗教

- 世俗化及宗教与文学的转换
- 两种特殊新教文化与德语文学

1624 年“德语诗学之父”马丁·奥皮茨发表了第一部德语诗学著作,其中开宗明义讲到:“文学从一开始就是隐匿的神学,表达的是神性的东西。”^①约 400 年后,德国学者薛讷在阐释保罗·策兰的诗时,认为二战后的德语文学仍不失“隐匿的神学”,策兰的诗仍然在借助基督宗教话语探索真理和存在本质^②;只是“隐匿”在今天又多了一层意思:神学和宗教日渐为多元文化所湮没,似乎真的“隐匿”起来。出于对宗教的漠然无知,人们也许永远无法认识文学隐含的深刻神学内涵。

① Martin Opitz: Buch von der Deutschen Doeterey. Stuttgart 1991, S. 11.

② 参 Albrecht Schoene: Dichtung als verborgene Theologie. Goettingen 2000, S.

世俗化及宗教与文学的转换

近代德语文学与基督宗教之间存在着一场激烈的互动。启蒙引发基督宗教的世俗化,哲学、美学、文学、艺术希望摆脱神学获得自律(Autonomie),从而转向人学和对人的关注。它们在摆脱神学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携带了宗教文化,不仅包括《圣经》语言和母题,也包括基督宗教的思想行为模式、伦理道德意识、政治神学话语。也就是说,伴随近代基督宗教世俗化、正统教会信仰式微,宗教传统和宗教虔诚以世俗形式转移到文学,潜在地影响甚至规定了文学创作和文本的深层结构。

“世俗化(Saekularisierung)”,广义上指永恒神圣事物的现世化,是一个与宗教与生俱来的绵延不断的过程,狭义上特指近代,尤其启蒙以后基督宗教的现世化,即神学转化为人学,宗教体系转化为人文体系的过程。^①“基督教文化(Christliche Kultur)”是基于文化学的一个宽泛概念,既包括宗教信仰,也包含各种相关文化现象。有文字记载的德语文学,产生于中世纪早期基督教文化语境中。历史上,每一次文学繁荣都伴随着世俗文化的兴起,这种规律在近代表现最为明显。世俗化并不代表基督教文化的消失,而是使基督教文化以隐秘的方式进入潜文本,并以不易察觉的形式弥漫于其间。对于考察潜文本中的宗教文化元素,另一个辅助概念为“虔诚(Froemmigkeit)”——宗教虔诚的世俗化表现形式。这一

^① 关于世俗化概念参 Arno Baruzzi: Zum Begriff und Problem Saekularisierung(《“世俗化”定义及问题》)。载于 Anton Rauscher (Hrsg.): *Saekularisierung und Saekularisation vor 1800* (《1800年前的世俗化进程与世俗化》)。Muenchen, 1976,第121—134页。

概念用来描述在世俗化的世界里,社会和个人生活实践中所保留的、源于宗教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这种“宗教虔诚的世俗化表现形式”既不同于神学教义,也不同于正统教会要求的宗教生活,它描述的是理论和制度变迁之外,内在宗教信仰、宗教情感、崇敬方式在生活实践中的表现。^① 这是解读文学中“隐匿的神学”的知识基础。

“虔诚(Froemigkeit)”的概念已普遍用于宗教社会学、宗教历史学研究。它具体指近现代,在部分社会群体背离宗教信仰,脱离教会组织的情况下,其虔诚的生活方式未就此消失,而是长时间保留并体现在社会 and 个体的生活实践中。“虔诚”,亦即宗教虔诚的世俗化表现形式,原则上覆盖整个日常生活,即“无论人们做什么、想什么、经历或体验什么,也无论人们工作还是休息、从事政治活动还是观赏大自然,从中都可以看出他们是否虔诚,或其所思所想、所为所感背后是否隐藏着某种信仰”。(Hoelscher,第12页)虔诚因此就不仅体现在正统教会信仰和教会生活中,也体现在各种非正统信仰和组织生活中。也就是说,所谓自由教会、自由宗教、分裂教派及其信徒——自由主义者、怀疑论者、秘社成员,或“修养宗教(Bildungsreligion)”的团体,即那些围绕人文偶像(歌德、席勒、荷尔德林、瓦格纳、尼采等)成立的协会,统统可算在内。这些人或组织无论信奉何物,从其信仰模式、情感、组织到崇拜形式,均体现出世俗化的虔诚,无异于世俗化的宗教模式。(同上,第14页)可见从广泛的虔诚概念出发,基督教文化同时包含宗教批判甚至是敌基督的思想。(同上,第14—15页)

近代德语文学记录了世俗虔诚的形态并参与了它的塑造。比之西欧邻国,德国的正统教会直到18世纪下半叶才真正受到冲击,出

^① 见 Lucian Hoelscher: *Geschichte der protestantischen Froemigkeit in Deutschland* (《德国新教虔诚文化史》), Muenchen 2005, 第11—12页。著作综合史学、宗教学、社会学、人学理论和研究成果,以史实、统计为依据,再现虔诚的生活方式在新教地区社会文化生活中的表现、发展和变迁。

现所谓“雅典和耶路撒冷之争”,即人文思想与宗教信仰的抗衡。^①而在德国占启蒙主导地位的莱布尼茨—沃尔夫体系,与法国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相比,更多处于经院神学和路德教传统,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②此时出现的文学经典,无论古典文学还是浪漫文学,也都更为明显地表现出宗教与文学的转换。与宗教世俗化相向运行的,也就是与世俗化同时发生的是文学的“神圣化(Sakralisierung)”。

从这一视角考察或可进一步理解文学中的理想主义,进而从根本上理解古典和浪漫文学。^③即便“纯文学”对于正统教会而言是异端,带有种种读神倾向,^④但无论诺瓦利斯还是荷尔德林,无论歌德还是席勒,其作品仍显示出世俗化的宗教虔诚。

具体来说,基督宗教的世俗化与近代德语文学的发展,主要发生在新教领域。由于宗教改革和随之而来的宗派斗争,16世纪以后德国的神学和宗教文学特别发达:路德新教和天主教(罗马公教)对峙,造成双方的知识精英聚焦于神学论战,由此产生丰富的《圣经》文学、赞美诗、布道文、檄文、论文和修身文学,它们在刚刚发明不久的活字印刷帮助下,广泛传播于城乡各社会阶层。丰富的宗教文学,尤其在新教地区,不仅滋养了日后的作家,同时也培养了读者。(占德国土地和人口一半的天主教地区,出于与新教不同的宗教文化,呈现出另一种格局,这一问题将另辟章节专门论述。)在新教的世俗化过

① Gerhard Kurz: Athen und Jerusalem. Die Konkurrenz zweier Kulturmodelle im 18. Jahrhundert (《雅典和耶路撒冷:18世纪两种文化模式的竞争》). 载于 Wolfgang Braungart u. a.: *Aesthetische und religiöse Erfahrungen der Jahrhundertwenden* (《世纪之交的审美与宗教经验》). 3 Bde. Paderborn u. a., 1997, 第一卷, 第83—96页。

② 参见 Herbert Schoeffler: *Deutscher Geist im 18. Jahrhundert. Essays zur Geistes- und Religionsgeschichte* (《18世纪德国人文思想:人文思想和宗教史论文集》). Goettingen, 1956, 第184页以下及第208页。

③ Gerhard Kaiser: *Erscheinungsformen der Säkularisierung in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des 18. Jahrhunderts* (《18世纪德语文学中世俗化的表现形式》). 载于 Anton Rauscher (Hrsg.): *1800年以前的世俗化进程与世俗化*, 第91—120页。

④ 参见 Benno von Wiese: *Gedanken zur Dichtung unter den Aspekten von Haerisie und Utopie* (《异端和乌托邦视角下对文学的思考》). 载于 Koopmann/Woesler: *Literatur und Religion* (《文学与宗教》). Freiburg i. B. u. a. 1984, 第11页以下。

程中,宗教文学的语言逐渐进入世俗领域和人文科学,反过来正在形成的文学也汲取宗教语言。17世纪巴洛克文学带有天主教宫廷特征,注重形式和修辞;中世纪晚期以来的德国本土市民文学低俗简陋。两者均不符合18世纪市民的品味和道德诉求。于是内容崇高、文风朴素、传播广泛的宗教文学和赞美诗,便成为启蒙—新教—市民文学的养料,为之增添了“奇光异彩”。^①

世俗文学不仅从神学和宗教文学汲取了具体的语言资源和修辞形式,而且借鉴了它们的素材和母题,尤其自觉或不自觉地移用了它们的思维模式。伴随语言和思维的转换,世俗文学随之获得了宗教内涵和维度。^②如荷尔德林所说,所有的宗教从本质上讲几乎都是诗意的,反过来所有的文学从本质上讲也都是宗教的。^③克罗卜施托克的《救世主》以颂歌形式抒发人的情感,虔诚赞美诗经克罗卜施托克的人文改造形成“体验诗”;^④浪漫诗人为诗和艺术赋予永恒、无限维度和救赎功能;赞美诗中对神的祈祷和倾诉,在世俗文学中转化为对人生恐惧和希望的独白。^⑤1800年前后的德语文学便是宗教世俗化

① Albrecht Schoene: *Säkularisation als sprachbildende Kraft. Studien zur Dichtung deutscher Pfarrersöhne*(《作为语言塑造力量的世俗化: 德语牧师之子作品研究》), Goettingen 1958, 第23页。

② 同上书,第25页。

③ Friedrich Hölderlin: *Ueber Religion*(《论宗教》), 载于 F. Hölderlin: *Sämtliche Werke und Briefe*(《作品书信全集》第三卷)Hg. v. Jochen Schmidt. Frankfurt a. M. Bd. 2, 第568页。

④ Gerhard Kaiser: *Klopstock, Religion und Dichtung*(《克罗卜施托克——宗教与文学》), 2. Aufl. Kronberg 1975, 第145页。克罗卜施托克《春天颂》中的诗句“主啊,主啊,充满怜悯和恩典的神”,源于耶和華在西奈山与摩西订立新的盟约时摩西对主的呼唤(出34:6)。这种引用对于今天的读者,尤其是基督教文化以外的读者十分陌生,但当时的读者很容易心领神会。Kaiser在该著作中详细阐述了德语诗歌如何通过虔诚运动转换到18世纪的体验诗。

⑤ Lucian Hoelscher: *Geschichte der protestantischen Frömmigkeit in Deutschland*. München 2005, 第64—65页。

与文学神圣化的动态结合,也是文学与宗教互动的直接证据。^①

为避开天主教一拉丁一封建的中世纪,18 世纪新教知识分子直接到古希腊寻找欧洲文化的源头,并试图以古代的“人文思想”、新人文主义对抗所谓基督教传统。1800 年前后的古典文学更是奉古希腊为圭臬。然而德国知识分子对古希腊的重视,以及良好的古代语言和文学修养,亦与新教世俗化密切相关:新教(尤指路德教)的《圣经》翻译以“回到源头”为指导思想,要求释经要参照原始语言,尤其确立了“唯独圣经”的教义,凡此种种,使得新教地区人文中学和大学特别重视古代语言的教育,古希腊哲学、文学、神话、戏剧便作为教材进入基础人文教育。18 世纪下半叶世俗化语境中,为数众多的青年学者放弃神学,转攻古代语文学、哲学,以后则无论教派,重视古代语言的传统造就了直至尼采和海德格尔的德国知识分子。而这其中的悖论在于,宗教和神学孕育了人文学者。

这种悖论导致 18 世纪文学的作者亦神学家亦人文学者,其作品亦虔诚亦读神。因其作品如其人,一方面保留了信仰,另一方面却置换了信仰的对象,奉人、理性、自然、艺术为偶像,以敬拜偶像的方式崇拜它们。无论哲学还是文学,无一不在宗教批判中确立自身的合法性,同时也无一不为自身赋予神学的使命:探讨终极问题、解释人与世界的关系、建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价值体系、寻找救赎。这对于人文科学是解放,是提升,对于各正统教会是高傲,是读神。“近代德语文学与基督宗教”问题的提出,正是出于对这种悖论的好奇。它主要关心和解释文学中的基督宗教思想源流、思维模式、情感表达以及文学中的宗教话语问题,亦即世俗化以后的文学为何仍然是“隐匿的神学”。

在德国,该问题在二战前从属于思想史研究,特别关注德语文学

^① Wolfgang Braungart u. a.: *Aesthetische und religiöse Erfahrungen der Jahrhundertswende. I: um 1800* (《世纪末的审美与宗教经验——第一卷: 1800 年前后》). Paderborn u. a. 1997, 第 10 页。

与新教文化的关系,有以此建构民族精神的倾向。二战后直至 1980 年代,文学与宗教问题再度受到学界关注,至 90 年代成为跨学科研究的显学。^① 重新认识文学作品中的宗教文化传统以及神学问题,在后现代语境中显得格外重要。德国从事该项研究的有神学家和语言文学家。前者关注神学问题,后者重在文学解释。学者中亦有微妙的教派立场之分,论述中不乏卫道色彩。在方法上,新教学者明显注重对语言文字的解释或文学与《圣经》的关联,天主教学者则更为关注文学中的传统。

选编修订自《隐匿的神学:启蒙前后的德语文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

① 1980 年代重要研究举要:Walter Jens, Hans Kueng: *Dichtung und Religion*. Muenchen 1985。汉译《诗与宗教》,李永平译,三联书店,2005 年;Gerhard Kaiser: *Pietismus und Patriotismus im literarischen Deutschland. Ein Beitrag zum Problem der Saekularisation* (《德国文学生活中的虔诚运动与爱国主义:世俗化问题研究》), Frankfurt 1973;Gerhard Kaiser: *Klopstock. Religion und Dichtung* (《克罗卜施托克:宗教与文学》), 2. Aufl. Kronberg 1975; Hans-Georg Kemper: *Gottebenbildlichkeit und Naturnachahmung im Saekularisierungsprozess. Problemgeschichtliche Studien zur deutschen Lyrik in Barock und Aufklaerung* (《世俗化进程中的人神同形论与对自然的模仿:巴洛克和启蒙德语诗歌研究》), Tuebingen 1981。1990 年代以来重要研究举要:Wolfgang Braungart: *Ritual und Literatur* (《礼仪与文学》), Tuebingen 1996; Wolfgang Braungart u. a.: *Aesthetische und religioese Erfahrungen der Jahrhundertwenden* (《世纪之交的审美与宗教经验》), 3 Bde. Paderborn u. a. 1997; Karl-Josef Kuschel: *Im Spiegel der Dichter. Mensch, Gott und Jesus in der Literatur des 20. Jahrhundert* (《20 世纪文学对人、神和耶稣的塑造》), Duesseldorf 2000; Georg Langenhorst: *Hiob unser Zeitgenosse. Die literarische Hiob-Rezeption im 20. Jahrhundert als theologische Herausforderung* (《我们同时代的人约伯:20 世纪文学中作为神学挑战的约伯形象》), Mainz 1994。

两种特殊新教文化与德语文学

“牧师之子”身份的作家

德语文学在 16 世纪宗教改革以后,于 17 世纪经历了一次世俗文学的繁荣——巴洛克文学。自巴洛克文学起,德语文坛不断出现“牧师之子(Pfarrersöhne)”身份的作家。巴洛克时期著名的有格里菲乌斯、保罗·弗莱明和菲利普·冯·策森。到 18 世纪这种现象更为密集:启蒙文学中有一半以上作家、文学理论家出身牧师家庭,著名的依次有戈特舍德、莱辛、维兰特、克劳迪乌斯、里希顿伯格、毕尔格、霍尔提、伦茨以及多数哥廷根林苑派作家。19 世纪文坛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这个传统。施勒格尔兄弟、小说理论家费舍尔、尼采和 20 世纪的本恩仍然在“牧师之子”之列。^①

根据《德语名人录》记载,从 1525 年出生至 1900 年去世的德语作家共 765 人,其中 8 位牧师之女,195 位牧师之子。也就是说,从宗教改革到 19 世纪末,有 1/4 以上德语作家是牧师之子。^② 若加上本

① 格里菲乌斯(A. Gryphius, 1616—1664),保罗·弗莱明(P. Fleming, 1609—1640),菲利普·冯·策森(Ph. v. Zesen, 1619—1689),戈特舍德(Gottsched, 1700—1766),盖勒特(Gellert, 1715—1769),莱辛(1729—1781),维兰德(Wieland, 1733—1813),克劳迪乌斯(Claudius, 1740—1815),里希顿伯格(Lichtenberg, 1742—1799),毕尔格(Buerger, 1747—1794),霍尔提(Hoelty, 1748—1776),伦茨(Lenz, 1751—1792),施勒格尔兄弟(1767—1845, 1772—1829),费舍尔(Vischer, 1807—1887),尼采(1844—1900),本恩(Benn, 1886—1956)。

② 此处转引自 Albrecht Schoene: *Säkularisation als sprachbildende Kraft. Studien zur Dichtung deutscher Pfarrersöhne*(《作为语言塑造力量的世俗化: 德语牧师之子作品研究》),Goettingen 1958,第 7—8 页。

人为牧师或学习过神学专业的作家,这个比例还会大幅上升。克罗卜施托克、盖勒特、哈曼、赫尔德、莫里茨、荷尔德林和莫里克等人学习过神学,其中赫尔德和莫里克本人为牧师。在瑞士文学理论家和作家中,波德默尔、布莱廷格学习过神学,拉法特和戈特海尔夫是牧师。^①

对于这一现象,薛弗勒(1888—1946)从宗教社会学角度,以大量翔实的作家生平为基础,进行了系统研究。薛弗勒是英国文学及宗教社会学家,受到特洛尔奇和韦伯启发,研究新教与文学的关系。他从与新教同宗的英国文学入手,以“牧师之子”现象为线索,考察17、18世纪英国文学的生成和发展。从宗教文化和宗教社会学来看,牧师职业和家庭教育的特殊性,有助于培养子女的文学修养,而牧师家庭特殊的宗教虔诚则通过“牧师之子”作家群体转移到英国启蒙文学,直接影响文学主题、母题和语言的生成。因此牧师之子很大程度上充当了英国启蒙文学的奠基人。^②

这项研究引起德语学界对本国文学中“牧师之子”问题的关注。二战后,德语文学学者薛讷(1925—)从文学解释学出发,紧扣路德教注重《圣经》和语言的特点,借助具体作家作品,即格里菲乌斯的诗歌和戏剧、比尔格的诗歌和谣曲、伦茨的戏剧、哥特海尔夫的小说以及本恩的诗歌,展示“牧师之子”作家如何在世俗化过程中,通过把

① 克罗卜施托克(Klopstock, 1724—1803)、盖勒特(Gellert, 1715—1769)、哈曼(Hamann, 1730—1788)、赫尔德(Herder, 1744—1803)、莫里茨(Moritz, 1756—1793)、荷尔德林(1770—1843)、莫里克(Moerike, 1804—1875)、波德默尔(Bodmer, 1698—1783)、布莱廷格(Breitinger, 1701—1776)、拉法特(1741—1801)、戈特海尔夫(笔名 Gotthelf, 原名 Bitzius, 1797—1854)。

② Herbert Schoeffler: *Protestantismus und Literatur. Neue Wege zur englischen Literatur des achtzehnten Jahrhunderts* (《新教与文学: 18世纪英国文学的新路径》), Goettingen 1922, 1958(2. Aufl.). 作者用大量篇幅梳理了从启蒙前到启蒙时期,牧师从宗教文学转向世俗文学创作的过程。启蒙时期的变迁与德国新教状况基本相同,见第46—59页。作者随后探讨了自然诗、墓园诗、民歌形成与牧师和牧师之子的关系、新教启蒙文学与希伯来文学和古希腊文学(荷马史诗)的关系、宗教文学与纯文学文体之间的关系以及市民社会与读者群形成的问题。

《圣经》、宗教赞美诗和宗教修身文学的语言转换到文学,来塑造德语文学语言,也就是,新教的世俗化如何成为“塑造文学语言的力量”,文学语言又如何在这一转换过程中获得了宗教内涵和宗教的神圣维度。(Schoene,第6页)

牧师和牧师之子转向纯文学(非宗教文学)的创作,与新教的世俗化及其特殊的宗教文化密切相关。宗教改革以后,德语区出现新教和天主教共存局面。天主教(罗马公教)方面自脱利腾公会(1545—1563)至19世纪末,严格限制神学家、神职人员和僧侣从事世俗文学创作,因此天主教方面具有良好语言和文学修养的知识阶层,均把主要精力放在神学研究和牧灵工作上。而在新教地区,继加尔文教之后,路德教也放宽了对牧师讲道的限制,允许牧师在不违背正统教义和道德原则前提下,进行世俗文学创作,并将其作为对传统讲道形式的补充。与之相应,原本刊印宗教书籍的出版社,允许印制纯文学作品。其次,天主教方面的学术、《圣经》和礼仪用语继续采用拉丁语,相比之下,新教地区更加重视民族语言,《圣经》、礼仪用语、教理问答、赞美诗、修身文学以德语为主,这不仅为世俗文学的创作培养了作家,同时也培养了读者。

第三个是自然因素,即天主教实行神职独身制,客观上不可能出现“牧师之子”现象。而在新教牧师家庭中,传统上子承父业,子辈在神学毕业后继续担任牧职。但出于种种原因,尤其在世俗化语境中,年轻人告别家庭传统,从神学转向哲学,从宗教转向人文,成为哲学家、文学理论家或戏剧家和诗人。

改行的现象同样出现在非牧师之子、但本人是神学学生的群体中,如莫里茨、荷尔德林、谢林、黑格尔等一大批神学专业学生。他们本该在完成神学学业后,担任牧师或神学家,但为启蒙时期活跃的哲学、美学、文学、戏剧所吸引,改变初衷,转而投身新兴的人文学科。因此牧师家庭或神学专业,就成为18世纪启蒙知识分子的摇篮。克罗卜施多克和莱辛一代出生在1720年代,赫尔德和哥廷根林苑派出生在1740年代,他们自18世纪中叶起,成为德语文坛的领军人物。

作为牧师之子或神学专业学生,他们凭借系统的宗教神学教育、良好的古代语言文学修养,不久便占据了新兴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由于当时尚未出现明确的学科划分,像莱辛、哈曼、赫尔德、荷尔德林这样集神学、哲学、文学家于一身的通才不乏其人。

那么从外部的宗教社会学和宗教文化角度来看,牧师或牧师之子群体的生活体验,为 18 世纪近代文学带来了哪些特殊现象、做出了哪些贡献呢?首先,薛弗勒以大量实证研究证明,牧师家庭会提供更为全面和深刻的宗教文化和古代文学修养。牧师一般与出生牧师家庭的女子结婚,母亲的宗教信仰和宗教虔诚转移到孩子的早期教育。父亲则由于职业关系,对孩子 in 教义、礼仪和文学方面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牧师之子通常通过宗教文学开蒙,参加更多家庭祈祷和宗教仪式,故自幼对《圣经》、教理问答、祈祷文、讲道文、礼仪用语、赞美诗和修身文学耳熟能详。新教牧师是分布在民间的知识和有教养阶层,尤其在乡村,牧师的书房往往相当于当地的图书馆,藏书中不仅有《圣经》、礼仪用书或修身文学,也不乏古代语言文学或历史哲学著作,牧师之子是这种小型图书文化中心的直接受益者。很多个案研究表明,牧师之子中师从父亲完成初级教育者屡见不鲜。出于新教对古代语言的重视,牧师之子一般在初学阶段,就会为学习古代语言,接触到古希腊神话史诗、诗歌戏剧及历史哲学文献,进而接触到古代人文思想。荷马史诗和古希腊神话,便由英国牧师凭借古代语言修养重新发掘出来。(Schoeffler,第 129 页)

其次在 18 世纪中叶,德语文学开始从效法法国古典主义(戈特舍德),取道苏黎世(波德莫尔、布莱廷格),转向效法(宗教文化上同宗的)英国自然主义。在接受英国传入的莎士比亚、弥尔顿和善感诗歌小说的同时,英国发掘整理民间文学的意识和成果也给德国知识分子带来启发。而在英国,这项工作首先发轫于牧师阶层。牧师与学院或宫廷学者不同,他们出于牧灵工作需要,必须广泛深入民间、接触大众,再加之学养深厚,搜集和整理民间文学的工作便成为水到渠成之事。英国 18 世纪在搜集整理凯尔特和威尔士民间文学方面